

疫情加速全球危機，中國還能憑什麼力挽狂瀾？

溫鐵軍

【導讀】就在中國抗疫之戰初現轉機之際，全球新冠疫情卻拉響警報，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等紛紛告急……與此同時，作為產業鏈佈局最完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按下的“暫停鍵”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不少人擔憂，疫情的全球擴散，可能會加速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的到來。溫鐵軍先生分析，當前金融資本全球化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高級階段，其在全球形成的產業佈局環環相扣，中間哪個環節出問題，全球危機就會被點燃。中國在抗疫之外加緊復產復工，也是對潛在世界經濟波動的未雨綢繆。他特別指出，在中國應對前幾輪全球經濟危機的過程中，農村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向縣以下農村發展城鎮化、發展中小企業、大量搞基本建設等等，都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釋放出巨量空間，從而能夠應對國外資本市場的壓力。而對於這次疫情，很多方面不可抗，但可抗的一個重要力量就在鄉土社會。鄉土將外部性巨大風險阻隔而實現“脫鉤”，自主處理內部事務，因而依然是應對全球化危機的最為低成本的載體。著眼未來，第三次全球化的代價一定會累積並最終轉化成危機爆發，面對這一規律，中國能否化危為機，我們需要做好準備。本文是 2020 年 2 月 17 日、24 日溫鐵軍教授在今日頭條直播演講的整理稿，由“鄉建院”整理並首發，感謝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 全球化危機是如何爆發的

1. 產業資本全球化

我把全球化危機分為三個階段。一個是前資本主義殖民化時期，產業資本主要在西方歐洲本土，在世界其他大陸就是原料產地，那個是產業全球佈局的第一次全球化，當時有大量反人類犯罪，尤其是西方做殘暴的奴隸制擴張，對當地民眾、尤其是尚在部落化的民眾，就是滅頂之災，原住民承載了第一次全球化代價。

第二次就不一樣了，產業資本很大程度是本土化的，主要集中在工業化國家，也因此，產業資本就是有國界，就是資本家是有祖國的。馬克思提出，工人階級無祖國，都是受到剝奪，無產階級提出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工人階級自己，中國共產黨也是按照這個指導思想實現路徑的。因為工業是有國界的，工業化過剩本來應該購買產品的人口因為不佔有財產，因此買不起，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一般內生性矛盾。於是，就演化出了世界大戰。

當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人想要把英國人早期殖民化所開拓的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改造成大陸戰略，我們說叫做陸權戰略。它想修鐵路，穿過土耳其，進入西亞、中亞、南亞，進而向東亞擴展。當產業資本開始尋找自己新的出路，德國試圖以基本建設推進陸權戰略改變大英帝國搞得海權戰略時，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地點，恰恰就是德國人想修鐵路、穿過巴爾幹半島，才能進得了土耳其，在這條路上，就變成衝突爆發點。資本主義內部發生衝突，特別是產業資本之間發生對抗性衝突，所形成的巨大代價爆發在西方國家內

部。西方國家在產業不斷演化成資產過剩，資產過剩的矛盾在內部爆發，內部爆發表現為戰爭，於是就有了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

這個生產過剩很有意思，當西方普遍發生第二次嚴重的生產過剩大危機，就是 1929-1933 年的這個生產過剩大危機，導致歐洲陷入戰爭；另一個現象很有意思，當時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美國、蘇聯並未陷入嚴重危機。

美國是靠著羅斯福主義，也叫做新國家主義，把美國過剩的生產能力轉移到超大型大陸國家的內陸建設，搞基本建設。也就是說，在一戰之前，德國人要搞得那條大鐵路（泛歐亞的鐵路）如果搞成了，至少能把德國當年形成的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消化在大陸橋上，但它沒搞成。羅斯福搞成了，他是把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轉向了內陸建設，去搞鐵路、公路、水利等等，這樣美國的危機就緩解了。

另外一個就是在當時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之下的蘇聯，列寧也認同國家主義的發展方式，斯大林繼承了列寧主義，形成了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他們在產業資本發生內部對抗性甚至激烈的戰爭形勢的危機爆發條件下，得以安然度過。

所以我們說第二次所謂全球化危機，是產業資本的危機。既是因為生產過剩是一般資本主義內生性矛盾，又是因為生產過剩而造成的對抗性激烈衝突戰爭，這些都是爆發在資本主義內部。第二次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導致接著再要發生戰後生產過剩，因為大家還是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在發展。於是二戰之後，美國和蘇聯分別形成了兩大陣營對抗，變成冷戰格局。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再爆發的情況下，形成了大量的局部戰爭，包括中國參戰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其實也是延續了產業資本對抗性矛盾的代價。

在這個階段，第三次大戰為什麼沒有打起來？產業資本的全球化為什麼沒有演化成世界大戰呢？是因為戰後當工業化再度恢復之後，接著就進入生產過剩。40 年代馬歇爾計劃，美國和蘇聯都先後形成產業資本崛起，蘇聯恢復了東歐的工業生產，同時也因為朝鮮戰爭，蘇聯向中國轉移了大量工業設備，也使中國進入工業化。美國呢，是在西歐恢復了工業生產，同時為了在朝鮮戰爭中就近支援，也幫日本重新建立了工業化，日本戰後工業化發展速度也很快。

戰後工業化，在歐洲、亞洲再度崛起的時候，六七十年代，這些工業地區，也再度發生了生產過剩，在那種情況下，產業開始外溢，特別是勞動與資本直接對抗的那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一般商品生產開始向外轉移，西方把加工業生產（勞動密集型的）轉移到比如拉丁美洲，像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等，這些國家相繼接收了西方的產業轉移。還有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相繼接收了日本的產業轉移，因為產業大規模轉移了，西方國家進入了不那麼激烈對抗衝突的時代，開始講究人權、社會發展、福利等，於是福利社會主義在北歐開始、萊茵模式開始在西歐形成，同理，日本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後，進入了裝備製造業和技術密切配合的新發展模式，東亞資本主義模式也問世了。

當西方向外轉移產業時，通常找到集中體制國家來接收產業轉移。六七十年代開始轉移產業，到七十年代開始大規模轉移產業，到八十年代產業轉移已經達到了相對比較大的規模了。接收產業轉移的，像當年巴西是軍政權，阿根廷、秘魯、很大程度上都是英格魯美利堅模式派生的一個體系，就是在拉丁美洲相繼形成了一批軍事政權，這些軍事政權恰恰是最能有效接收西方產業轉移的。日本產業轉移到四小龍：韓國是軍事政權，臺灣當時還在戒嚴時期，泰國是軍事政權，馬來西亞、新加坡是比較集中政治體制，菲律賓都是軍事政權。軍事政權的國家，以他們國內的沒有那麼強的勞工運動，接收了西方產業與勞動對立的轉移，形成了產業資本全球化的矛盾轉嫁，首先是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性矛盾轉嫁到了發展中國家。從此以後，轉移出產業的主導國家就有了高度，道德、人權、社會福利的高度，於是就有了先進制度和落後制度。早期恩格斯寫工人階級運動時寫得很清楚，英國這個社會如果不是通過血腥方式大量佔有了海外殖民地，怎麼可能拿到大量海外殖民地的收益呢？英國工人因為分享了殖民地所獲取的超高收益而貴族化了，不再是馬克思原義上的工人階級運動了，所以恩格斯後來分析的很清楚。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我們怎麼看西方理論、說教、意識形態和宣傳，我們都要看清楚這是個在世界結構改變的過程中的成本轉嫁。

2. 金融資本全球化

當產業資本全球化，西方把產業資本大量外移時，就和現在有關了。為什麼美國現在強調就業？隨著一般產業對外轉移，把勞動密集型產業都轉移出去了，接著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主導國家就進入金融化了，於是我們把八十年代以來的變化叫做“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這意味著印錢，用這張紙支撐著產業對外轉移，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用這張紙來做全球貿易結算，於是要求這些發展中國家只要接收它們的產業，就要用工業的方式生產，就必須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才能買賣。

這就是西方主導國家快速進入的金融資本階段。金融資本階段兩個重要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英國，這兩個國家先後都達到了 GDP 的 80% 以上，來源於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這叫做經濟結構高度化，或叫做經濟結構現代化，佔據了主流地位的話語權，變成了金融資本階段全球化，以金融化來化全球。

所有接收西方產業轉移的國家，都得用西方的金融資本，以及這個金融資本制度所提供的服務，並且要按這套制度運作，才能跟得上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需求。金融資本因為通過產業資本在全球佈局，獲取了極大的超額收益，進入了現代化。金融資本全球化派生和促進著產業尋找要素價格低、最能夠掙到收益的地方，所以，產業全球佈局形成產業全球分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只掌控個別產業部門時，不再能夠形成完整產品了。它一定是在中國、越南、印度尼西亞等這些人口相對規模大、勞動力資源總量大、勞動力價格低的地方進行產業轉移，像一般性生產，衣服帽子鞋子不需要在發達國家生產了，它就給你品牌，你打它的包裝嘛。進一步，當這個 IT 發展起來以後，這些程序員寫程序

在西方，就是“髒活”，它不是顯得很高大上的勞動，這些活兒就轉移到了印度，因為印度人說英語，所以是能夠跟西方接軌的，印度勞動力又便宜，於是印度變成了軟件基礎工作的地區，將勞動密集型的軟件打包變成發達國家的活兒，發達國家就佔有了知識產權。因此有了一套新的在金融資本主導下的虛擬資本全球化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全球化。

現在的金融資本全球化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高級階段，在這個高級階段在全球形成了產業佈局，每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的。就導致很重要結構性變化，其中重要現象就是產業全球佈局，服務業也全球佈局了，中間哪個環節斷掉了，全球化就發生危機了。

■ 疫情爆發如何影響全球危機演變與中國發展進程

疫情爆發在中國，會怎麼影響？會跟全球化危機有什麼關係呢？因為中國到現在為止，還不能全面復工復產，大概個別地方有復工復產，但只有不到 30%，很直接影響了全球產業鏈。日本、德國、美國，美國對中國產業依附程度最高，30%左右，越是依附程度高的，就越是受產業鏈的影響。我們是世界中間產品的提供國，我們勞動力素質很高，又是所有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這裏任何零部件都做得出來，零部件只有拼裝出來，才能方便成批出口，中國在產業資本的環節上是生產部件的，當部件不能恢復生產時，那無論日本、韓國、美國、歐洲，一樣會受到影響。這是很重要的對產業佈局的影響。

接下來去看，中國會發生什麼？假如這個繼續下去，企業難以為繼，大量工人失業，企業貸款就會變成壞賬，壞賬變成銀行的大量不良率。假如整個經濟繼續下去，會導致生產出問題，結果會派生出社會問題，如失業、大學生就業、企業破產倒閉導致銀行壞賬增加，債務因經濟不景氣而難以為繼。我們是按照全球產業佈局形成的，會使產業鏈上其他國家受到直接影響，反過來也會對我們產生影響。中央領導給出的政策安排，就是既要以舉國之力去抗疫，防止擴散；另一方面，要求及時復工復產。這就是這次如果中國停下來，全球化危機總爆發，當然我們的危機也會總爆發。

金融資本也是這樣的。你們看全球都在幹嘛？量化寬鬆。不叫量化寬鬆，沒有人再用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在美國叫 QE，它就是大量增發貨幣，使得流動性充裕。但那個時候是 2008 年，華爾街海嘯，主要是金融資本遭遇危機。因此奧巴馬政權大量增加流動性，給金融資本的投資商，讓他們把增加的投資能力投到原材料市場、石油市場，投資到各行各業，於是美國活了，因為它本來就是靠金融資本全球化形成全球統一能力，它當然度過了這場危機，但接著就導致了沒有這種能力的國家相繼陷入危機。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美國依靠金融的轉嫁能力，將過剩的金融資本轉向世界市場，造成嚴重的全球通脹。

所以接著上一輪寬鬆，寬鬆了三輪、四輪以後，到 2013 年，美國說停了，危機過去了，量化寬鬆停了，一停立刻進入通縮。2013 年、2014 年前後，那些過去原材料價格猛漲，大量佔有溢出效應的，價格一漲就溢出了一大批收益，一些國家就享有了收益，比如拉美一些國家，比如伊朗，就

比我們早一步成為美國敵人。我們比他們晚，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幫美國消化通脹。客觀上，中國這個大國正在產業崛起過程中，產業資本發展趨勢尚未停下來。接著，隨著通脹導致世界需求下降，中國就已經出現了產業資本因外需下降而不景氣。這個階段上我們大規模啟動新農村建設，大規模啟動鄉村振興戰略，把產業過剩能力轉向內陸建設，這有點像當年羅斯福新政做法。

所以這個階段，中國就出現了被很多人批評，說國有企業佔用了大量投資，卻沒效率。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事實，它在做基本建設時怎麼可能有效率？哪個基本建設可以短期回收？把大量工業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基本建設，往農村投基本建設它短期內能有回報嗎？它能產生收益嗎？能產生稅收嗎？你說你給農民修路，我們現在基本上做到了 99%左右的農村通路，100%的農戶通電，你往農村修路通電這些事兒，誰幹的？是私人企業幹的嗎？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爆發危機先造成通脹後造成通縮的時候，我們就是先進口通脹後進口通縮，但畢竟維持住了，我們的產業鏈條依然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啊。因為最完整，所有的生產都在你這兒至少完成個部件，完成個組成，才能拿出去變成整體、貼牌子啊！這就是今天所謂全球化的實際結構。

上次危機中國基本上都頂過去了。先用新農村建設，向縣以下農村發展城鎮化、發展中小企業、大量搞基本建設，算基本頂過去了。這一輪呢，我們靠鄉村振興、產業興旺、生態建設、扶貧攻堅，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拿錢去投的，你說短期有回報，不可能。如果不是國家大，有這麼大的空間、地盤、農村可以容納，上次全球化危機，中國撐不住，世界撐不住。

這次，中國在勉力支撐產業結構的全球佈局，在支撐著世界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目前這種狀況，是非常兇險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還要稍微做點分析，美國人從 2018 年跟中國打貿易戰以來，也是在不斷調整過程中。美國為什麼打貿易戰？我們客觀分析，因為美國從 70 年代，放棄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後，仍然維持了全球 70%的結算貨幣，60%多的儲備貨幣，這樣世界第一金融資本核心大國的地位。它可以靠著玩金融掙錢，不用苦哈哈的幹產業，但金融恰恰是就業率最低的。所以客觀上導致美國失業很普遍，當產業外移時，就業大幅度減少，支付各種各樣的所得稅也要減少，政府稅收下降就得靠政府發債，越發債越依賴金融，越依賴金融就越金融擴張，就越要走向全球金融化，所以美國很重要問題是因產業外移導致的大規模失業。

當美國發生危機，需要產業轉移時，正趕上中國大規模建設，基本建設條件最好、勞動力素質高、勞動價值低，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資本國家，中國崛起了，中國成了世界上工業生產總量最大、進出口總量最大、金融資本總量最大的國家，當然這都是外資幹的，我們大類產業三分之二由外資控制。因此我們納入全球化，是產業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客觀的形成了結構佈局。在這種情況下，當中國把國有部門加強，用國

有部門向內陸搞基本建設時，就維持了產業資本最大國家的結構地位，在這個產業資本的全球佈局中，中國地位到目前為止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川普作為美國總統，也有自己的想法，代表美國工人、美國家庭，讓美國再次偉大。怎麼再偉大呢？唯一能支撐住的就是軍事霸權，支撐著資本主義金融化，軍事霸權背後還得有產業資本，至少是重要的裝備製造業。這個全球化仍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仍然決定著全球化危機必然爆發。

所以說我們這次疫情影響，導致全球化危機爆發，應該說是客觀規律。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什麼趨勢呢？比如有些人開始談脫鉤。脫鉤這個理論，是第三世界重要思想家叫薩米爾·阿明所提出的，叫做第三世界的依附理論，發展中國家都在依附發達國家，怎麼才能有獨立的主權？有自主的發展呢？說只有“脫鉤”。他給出兩個趨勢，一個是鉤連，一個脫鉤。中國歷史上有過“脫鉤”，那我們說當全球化危機幾乎符合客觀規律、走向爆發的趨勢已經顯而易見，我們要考慮到可能出現脫鉤。

脫鉤意味著什麼？這次疫情止於何處？止于鄉關。以舉國體制去調動力量，去應對疫情，當然是很重要的，是主攻方向。但大家看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被忽視，是農村衛生防疫力量最薄弱，但農村卻恰恰可以實現脫鉤，是在地化的。恰恰是農村基層幹部，阻斷了疫情。最沒有防疫能力的地方，大多數縣頂多只有幾個或疑似的確認，很多縣一個死亡都沒有，取決於我們還沒有把農村破壞完，農村還有自主生存能力，有自給自足的能力，農村完全可以把自已封閉起來，實現在地化。這次疫情爆發，很多事情是不可抗的時候，可抗的社會力量，還是在鄉土社會，我們看到鄉土社會的作用，依然是把外部性巨大風險阻隔，自主處理內部事務，讓它變成一個脫鉤，可以本地化，是應對全球化危機的最為低成本的載體。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怎麼評價鄉村振興、怎麼評價生態文明都不過分，中國在 21 世紀提出的重大轉型恰恰是偉大復興的基礎。這次疫情是對中國的大考，不僅是對治理能力的大考，對中國的發展模式也是大考。

■ 中國應對全球化危機的歷史經驗

從中國疫情爆發以來，對全球產業資本佈局、全球金融資本吸取、各種產業資本所能形成的利潤能力都有極大影響。第三次全球化的代價一定會累積，最終轉化成危機爆發的，因為它是規律的表現。我們怎麼會遭遇到全球化危機？輸入型的通貨膨脹與緊縮都是典型的經濟危機現象。所以我們把目光放回到中國的大轉型時期。

1. 1960、1970 年代：接收產業轉移引發的問題

在戰後，特別是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兩個雙寡頭的地緣政治分割控制，這個過程分別是兩個超級大國分別向各自的地緣控制勢力範圍轉移了他們的工業體系。於是，世界進入了戰後的再工業化過程，1917 年結束到 1929 年，大概就十幾年的時間，世界在西方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一

次大戰之後的生產過剩大危機。同理，在二戰之後，1945 年結束二戰，1947 年馬歇爾計劃，1950 年蘇聯向中國轉移重工業、設備製造業，這個過程導致了客觀結果，即戰後再工業化，非常快速形成工業生產能力不斷擴張，最後演化成戰後的工業生產過剩。在生產過剩條件下，當然會出現經濟危機，這個經濟危機早先仍然主要發生在西方國家，於是在西方國家出現了非常劇烈的社會反抗。法國 60 年代爆發過紅五月，那是街頭暴力的革命，日本爆發了赤軍，也是發展城市遊擊戰，意大利有紅色旅，美國有黑豹黨。當時在中國，毛澤東思想是佔據第三世界國家陣地的重要思想流派，當時就是中國 60 年代的階級鬥爭，當時那個時候中國還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但這個世界在 60 年代是動盪的，在西方主要跟戰後的生產過剩有一定關係，當然也跟東方形成的革命思想有一定關係。

這接著導致西方把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所描述的“勞動與資本之間直接對抗的矛盾”，伴隨著勞動密集型的一般生產、一般製造業向外轉移。日本的產業轉移導致了亞洲的四小龍、四小虎，美國的產業轉移導致了美洲的相對集中體制國家形成了一般的工業生產能力，亞洲轉移的主要是軍人政權國家、集權體制國家，拉美也轉移到軍事政變所形成的軍事政權國家，這個過程在 70 年代普遍發生。這些都是符合產業轉移資本與勞動之間直接對抗性衝突，如何讓對抗性衝突能壓得住，只有這種體制才壓得住。所以，西方的產業轉移在那個年代儘管在西方形成了自由人權、福利社會等等一系列社會變革，但在發展中國家，其實客觀上只有利用發展中國家的集權政治，才能轉移得了西方這些勞動密集產業。請大家注意，難道僅僅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嗎？中國是什麼時候接受西方產業轉移的呢？恰恰是 1972 年尼克松訪華。其實 1971 年，尼克松訪華之前，安排中蘇對話的時候，基辛格就是帶了一個大禮，解除對華的禁運不包括軍事、技術等，主要是一般產品的生產，這些可以對中國轉移了，恰恰符合西方產業對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大趨勢。因為尼克松訪華，解除了一般商品、一般生產對中國的封鎖，這個封鎖是 1950 年代朝鮮戰爭開始形成的，一直延續到 1972 年開始解除。於是 1973 年，時任領導人親自制定了當年叫做“四三方案”，引進 43 億美元的西方設備和技術，來改造中國從 1950 年接受蘇聯的工業模式。蘇聯當年向中國轉移的是重工業、裝備工業、設備製造業，而且這些是服務於軍工生產的，1950 年朝鮮戰爭得到了蘇聯重工業的產業轉移，但是缺輕工業、紡織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缺很多。於是，正好借著 70 年代西方產業大幅度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機會，中國開始了開放。

其實從 1863 年、1864 年前後，李鴻章、左宗棠在浙江和江蘇分別對抗太平軍時，通過洋槍隊作戰，發現西方技術是厲害的，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換做今天的話說，就是“引進消化吸收”，從 70 年代開始，又做了一次“引進消化吸收”。1973 年引進，1974 年立刻轉化成中國的財政赤字，不是說任何事情都符合規律，但是大部分經濟發展過程中間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情況和問題，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時財政是非常有限的，60 年代我們是一窮二白的，只要開始引進，一定會變成財政債務負擔，直接轉化成赤字。1973 年引進，1974 年赤字就突破了 100 億，危機就爆發。在過去我們的財政三大部分，一是政府支出，財政拿三分之一以上保政府支出；第二部分是社保，這是一天不能少的；剩下

三分之一才是搞建設的。1974年前後，我們財政出現 100 億赤字的時候，只能砍建設，因為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沒了。

這個時候，並不能因減少投資不擴大再生產，債務就沒了。所以大家注意，七十年代，所有發展中國家只要接受了西方的產業轉移，都開始出現因債務轉化成赤字、赤字要麼不能轉化成開支、要麼不能擴大再生產，因此從七十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進入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主要矛頭轉向對本國政府、政治。西方產業轉移，把勞動與資本直接對抗的矛盾轉嫁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僅僅有十幾年的工業增長，接著就轉化成增長背後的負債，這就是產業資本全球化的代價在發展中國家爆發。

那中國呢，1974 年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制定四三方案的領導人相繼去世。接班的領導人按照“引進消化吸收”的方案執行繼續引進，於是 1977 年，時任等搞經濟的領導班子聯合制定了八二方案，由於錢不多，還不起如此多債務，所以 82 億美元引進分 8 年、平均每年引進 10 億左右。但各地比較著急，急於工作上項，短短兩年不到，就把這 82 億計劃幹進去了，接著就導致了更嚴重的財政負擔。1979 年，財政赤字差不多 200 億左右，財政赤字翻番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靠引進消化吸收，接受西方產業轉移，轉移過程中都有代價，都在爆發。

對於西方制度構建本國制度的國家，就轉化成了社會動盪，社會動盪儘管換了政府，債務並沒有減少，八十年代出現了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開始反債務運動，打出口號——“我不欠你的，我不還你的”。於是國際性組織像世界發展銀行開始在嘗試著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就出現了新潮流，從產業轉移、技術轉移變成制度轉軌。於是改革隨著開放而派生，隨著對外資開放、產業轉移到你的國家、在你的國家變成債務、對債務承擔不起形成社會動盪、社會動盪改朝換代形成新的政治體系，這個政治體系怎麼建立制度呢？請西方來幫你建立制度。當時思想界、理論界，大部分認為我們的制度有問題。是不是有問題？當然有問題，世界上哪個制度沒問題？

其實我給大家提供的是背景材料。如果僅僅用一般意識形態分析某些問題，很容易說都是制度不好，這個太容易了吧？如果你把思想就放在這個水平上，很容易找到解答，得到這種解答不奇怪，也不是錯，只是想告訴大家，前面可能還有前因，你現在看到的只是後果。

這事兒我怎麼就好像跟一般人說法不一樣呢？是因為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我是當時中央機關裏做洋務的，我幹的就是配合世界銀行代表團在中國推進轉軌，我是當年的當事人。二十世紀又有一批做洋務的，我是一員，那時候中國政府有個工作組，我是幹技術活的，把我送到美國學校去學操作，怎麼制定方案、監測評估、怎麼以一定數據為依據的、實驗條件下的制度安排來跟西方做對話，我們的做法如何、意見如何，我是出那個技術檢測報告的人。這個過程，我是參與者。

2. 八十年代：最主要的突破性改革在農村

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最主要有突破性改革，得到世界公認的，是在農村。當然要把農村轉軌變成西方樂於接受的解釋——我們是在農村推進了市場化。

中國農村幾千年都是多元並舉、多業態的生存狀態，結果現在把農民放了，1980 年以後，農民就開始多業並舉，把中國救了。因為本來就缺重少輕、產業不完整，當時農民占總人口的 85%，村裏什麼經濟形態都有。接著農民又發展了鄉鎮企業，鄉鎮企業迅速崛起，把一般商品生產包下來了，並且很快從 1979 年、1980 年開始，在三五年內，鄉鎮企業就扮演了出口創匯非常重要的力量。中央給農村出政策，既然你能創匯，鼓勵你創匯，離香港、臺灣近的福建廣東沿海一帶，離韓國近的像山東、遼寧，很快形成了輕工業、電子產業、紡織業的幾大片，就是遼東、膠東、蘇南、浙北、廣東珠三角，這一片就起來了，成了中國創匯很重要的力量。國家適當的向他們政策傾斜，我們就用這些——放開之後農村所形成的興旺發達的局面，編了很多報告給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就把中國當成了好學生，是世界上轉軌最成功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認可，認為中國是市場化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等等。

八十年代，就是農村一片天地，托起了中國在整個世界的崛起。當然不僅僅是這樣，但相對而言，農村在這個階段確實是發展的很快。當時領導人說，沒想到農村改革，一蹶子刨了個大金娃娃。尤其是，後來總結時說農村改革是黨領導下農民的三個偉大創造：第一，家庭承包，第二鄉鎮企業，第三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還有城鎮化，城鎮從改革之前不到 3000 個，到十年後發展到 30000 個。城鎮大量需要基本建設，於是把城市工業拉動起來了，當然農民搞得小經濟也大量需要設備，把城市大工業設備也帶起來了。

所以，這個階段中國融入全球化，沒有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陷入債務危機，發生翻天覆地的動盪。在 70 年代接受了西方一般生產的產業轉移，到了中國後，這個債務我們認真對待，在不能開支的情況，先放開農村，農村猛地發展出來了“三大創造”，既解決了糧食問題，又解決了輕工業、化工業、一般紡織工業等等。

這樣發展了十年後，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種兼業搞工業的勞動力 9600 多萬，接近 1 億，好像到了九十年代初，就 1.2 億了。那個年代，8 億農民有 1 億轉移了，而且是不造成交通壓力、社會負擔。農民就是在家門口，早起幹點活，然後去工廠上班，下午五點下班回家還能幹兩小時，多業態在農村被自然整合。那時候為什麼農村工業化發展這麼快呢？因為當時很多集體經濟還得計工分，你要想進廠上班得抓鬮，並不意味你進廠上班比農業勞動力拿到高多少倍的工資。而且在大田勞動，拿的工分比進廠拿的工分高，因為大田勞動辛苦程度更高。於是，工農業勞動力剩餘價值部分被集體佔用了，因為集體用本村地、原材料、勞動力不要錢，所有這些條件下，我們這裏的資本原始積累和馬克思所說的田園詩般的那東西有一定的一致性，並沒有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殘酷壓榨，這兒資本原始積累靜悄悄。短短十多年時間，中國農村工業化占了整個工業增加值的一半以上。

所以我們說，中國渡過了七十年代債務危機，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走了不一樣的路，不是誰的主觀選擇，它是一個客觀過程。這個客觀過程，導致大量農民形成半農半工的就業，極大的節約了勞動力必須到城市去的轉移成本，這些轉移成本就轉化成中國的改革紅利，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變成中國很重要走出危機的現象。

3. 八九十年代：跌宕起伏中的“偉大鬥爭”

原來我們的工業計劃只是在城市，大量資金分配、原材物料都是分給城裏，突然有個能夠占到工業增加值一半以上的農村工業，它的資金、原材物料、市場怎麼辦？過去是分配的，現在怎麼辦？於是它就極大衝擊原有在城市的這套體制，農民一搞加工業，原材物料就緊張了，農村一發展城鎮化，它就十倍的增長，基建三材也就緊張了，直接影響了城市的經濟秩序。

但城市更受不了的原因其實是七十年代後期的一些政策，比如知青回城的就業問題。1979、1980年知青回城的時候，正趕上財政嚴重赤字、擴大再生產能力極度匱乏，導致沒有就業空間。當時出臺的政策，是五個人的飯十個人吃，要求國有企業打開大門，把自己的子女招進廠頂崗，父母都是老工人，也是技術骨幹，於是他們就下崗了。不過，整個國企人力資本素質就變化了。機關怎麼辦呢？就機關就打開辦三產，大家開始辦公司，當時就是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待開張，倒幾道之後，這個PPI就受不了。一方面國企人浮於事，一方面又是價格猛漲，就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我們說農村救了城市，但陡然崛起又客觀上形成壓力導致城市原有體制不適應，派生了一系列問題。

這個時候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意識形態真的玩，說不定還不如當年蘇聯，蘇聯就是真接受了。我們是按照自己國情走了中國特色市場化道路，1988年開始嘗試著放開物價走市場，原材物料價格太高，連續幾年的通貨膨脹了，於是試著價格闖關，導致了1988年18.6的物價指數，到1989年就變成了生產停滯，因為是三角債，大量企業沒法生產，沒有資金，所以連續兩年發生經濟危機，接著中國就出現了比較嚴峻的局面。再加上1989年6月，美國宣佈對中國制裁，西方國家開始大規模撤資，中國正在工業化高漲時期，遇到撤資，怎麼辦？中國經濟進入了嚴重衰退。1988、1989年是滯脹危機的爆發，1990年進入大蕭條，正是需要資本的時候，中國從1991年開始，逐漸放開了國內的資本市場，證券、期貨、房地產相繼在1992年前後放開，同時自己增發貨幣、國債，利用財政金融主權仍然掌握在自己手裏的機會，自主金融，形成中國經濟基本增長的能力。但是由於1993年增發貨幣，94年導致極高物價指數，嚴重通脹，加上債務，危機再次爆發。

我們一直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如果老老實實看歷史的人，會發現每次跌宕起伏都是偉大鬥爭。當時，老布什是中美建交駐中國聯絡處主任，還當了第一任中國大使，對中國多多少少瞭解，他知道封不住。那時急於向外轉移產業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紛紛進來，向中國轉移投資，如新加坡在蘇南辦產業園。一方面我們自主金融，一方面周邊國家向中

國轉移產業。1993、1994年，美國開始放棄了對中國全面封鎖，所以我們終於度過。當1994年又有高漲的時候，當時香港、臺灣製造業大部分一般生產全進了中國大陸沿海，這個階段外向型經濟突飛猛進，經濟秩序有很多嚴重問題，於是農村鄉鎮企業出現大規模倒閉破產，2700多萬家鄉鎮企業倒閉，只能自己兜著。這樣農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向中國沿海轉移，出現了一江春水向東流，造成了社會秩序混亂。

這個階段上，出現了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這些債務沒法承擔了。這些國家在興旺發達時所形成的各種投資瞎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1992、1993、1994年美國軍事技術解密了，它過去是發明電腦、IT來指揮全球軍隊統一行動，蘇聯解體了，它的主要敵人不存在了，美國變成超強，於是把軍事技術商用化了。1994年前後，出了大批IT公司，吸納資本回流美國，於是商品生產的東亞國家紛紛進入危機，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這是這個階段全球資本流動所造成的客觀結果。

1997年11月份，國家召開全國金融會議算大賬，發現中農工建四大行不良資產占比高達30%以上，按說我們比東亞金融危機的國家都嚴重，但就是中國這個體制，財政金融不分家。也怪不得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國有企業在九十年代不景氣的時候抓大放小，4000多萬職工待業，那時候是嚴重的大危機局面，國家要求銀行給幾乎關門的企業繼續發工資性貸款，給下崗工人保命錢，那時候秩序很混亂。九十年代後期這場危機爆發的時候，是幾十萬家國企抓大放小，是場嚴重的危機局面，怪銀行嗎？不應該怪，其實是整個國家面對世界大變局，產業資本全球佈局過程中形成的非常嚴重的失衡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自己的經濟社會結構也發生改變，1997年東亞危機爆發盤點，發現我們的不良資產率非常高，財政一次性把不良資產剝離，用國家財政管的外匯注入到銀行，讓銀行乾乾淨淨的變成商業銀行。這就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金融資本的全球化，中國基本上趕上了，是因為我們在九十年代後期，徹底把銀行變成了商業銀行，但資本金80%以上是國家的，還是國有銀行，國家對國有銀行仍然說了算。國家財政和國家金融雙手操作，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全球金融化的大危機中，仍然有偉大鬥爭的條件。

所以說大變局，回顧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變化過程，有助於我們在疫情中理解全球化出現嚴重危機時有效應對。我所說的一切是一家之言，僅供參考，假如真想批評我，也請邁開雙腳去走走看看，有了真實感受後，我們才能展開談論。